



钟离君柏墓

(中册)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蚌埠市博物馆 编著

阙绪杭 主编



文物出版社

钟离君柏墓

(中册)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蚌埠市博物馆 编著

主编 阚绪杭

第十三章 解读考证研究

上古宇宙观的考古学研究

——安徽蚌埠双墩春秋钟离君柏墓解读

冯 时¹

安徽蚌埠双墩春秋钟离君柏墓的发现不仅为钟离国历史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更重要的是，其独特的墓葬形制完整地展现了上古宇宙观的丰富内涵。本文将考古资料与文献史料互为印证，揭示了墓葬自封土以至墓室的六层结构所具有的文化含义。以五色土遗迹以证月令思想，圆壁遗迹以论盖天观念，放射遗迹以明星象之象征，土丘遗迹以见形埒观念，山缘遗迹以示八极观念，“亚”形墓室以究宇宙观之发展。墓葬独特形制的设计旨在体现以祖配天的传统宗教观，体现了淮水流域古代文化的地域特色，并对邹衍学说的形成及《淮南子》宇宙观的传承产生了深刻影响。

一、绪 论

考古学是利用古人留弃的遗迹遗物重建古代社会历史的学科，由于相关的实物数据多属先民的物质遗存，因此作为古史研究的直接史料，考古学研究对于古代物质文化的探讨无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然而就建构一部真实的古代历史而言，仅满足于人类物质文化历史的建设显然极不完整。理由很简单，人类社会的历史不仅包括物质文化的历史，而且也包括精神文化的历史。这意味着真正意义的考古学研究既要揭示古人的物质文化历史，同时也要通过这些物质遗存研究先民精神文化的历史。换句话说，我们不仅要关注古人是如何生活的，更要关注他们是如何思想的，这些思想可以概括为一种独具特色的传统宇宙观，涵盖了古代时空观、政治观、宗教观、祭祀观、礼仪制度、哲学观以及科学观。由于这些基本观念构筑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涵，因此，对于上古宇宙观的探索其实有着比一般物质文化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意义，这当然是考古学研究不可或缺的工作。

利用考古数据重构上古宇宙观尽管十分困难，但是只要以坚实的文献数据作为基础，这个工作

¹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就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事实上，上古宇宙观的考古学研究几乎是解决上古形上思想问题的唯一途径，古人留弃的实物资料提供了大量丰富的形象物证，可以弥补文献史料之不足，而且其明确的时代性与地域性更为传世文献所不及。当然，文献史料的意义同样不容低估，考古遗存内涵的揭示如果没有相关文献的左证则势必流于玄想，以致降低了实物史料的应有价值。因此，将考古数据与文献史料彼此结合且相互印证，并在相应的制度背景与思想背景下分析研释，则是探讨上古宇宙观的有效方法。

钟离国是鲁昭公二十四年（公元前518年）灭于吴国的嬴姓小国^①。安徽蚌埠双墩春秋钟离墓的发现（图一）^②，为钟离国历史及上古宇宙观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该墓（编号双墩一号春秋墓）出土铜鼎5件，铜瑚4件^③，铜罍2件，铜豆2件，铜甗1件，铜盃1件，铜盒1件，铜勺2件，以及铜盘、匜各1件，并有铜钮钟9件，石磬12件，另见车马器、兵器、陶器、玉器、金箔饰件和贝饰。其中铜瑚（M1:376）铭云：



图一 钟离君柏墓封土

隹（唯）正月初吉丁亥，童（钟）丽（离）君柏弄（择）其吉金，乍（作）其飢匡（瑚）。

又钮钟（M1:1）铭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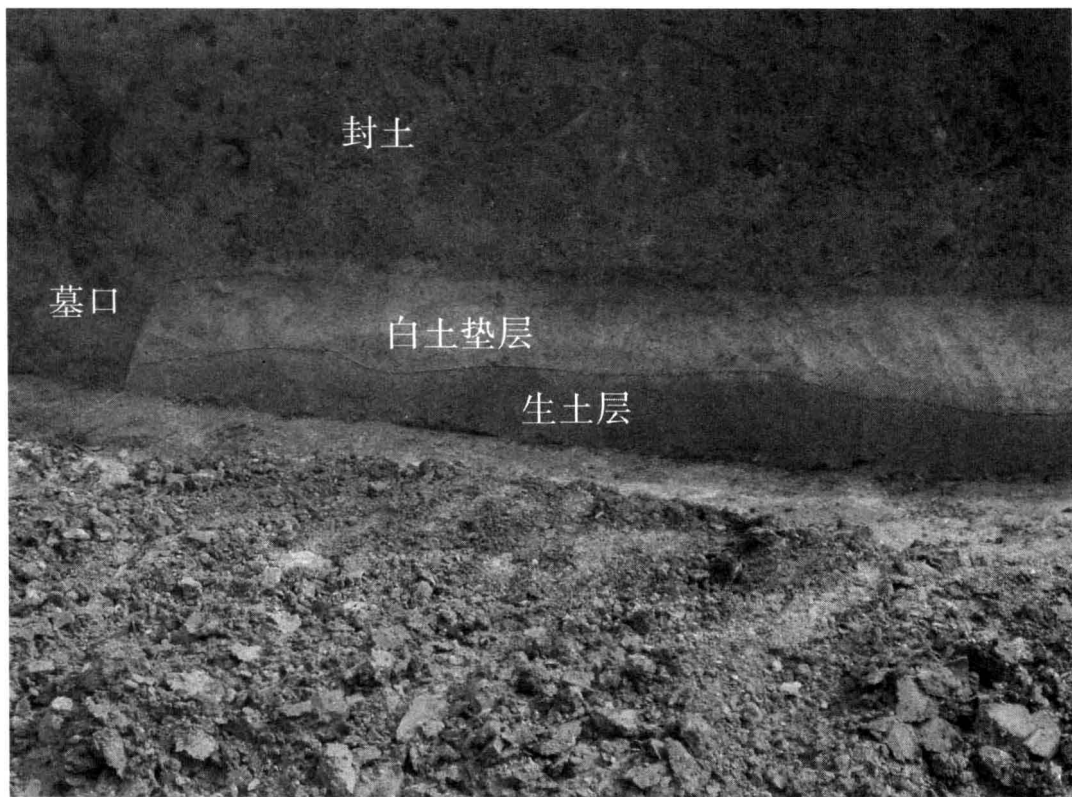
隹（唯）王正月初吉丁亥，童（钟）丽（离）君柏乍（作）其行钟，童（钟）丽（离）之金。

又铜戟（M1:47）铭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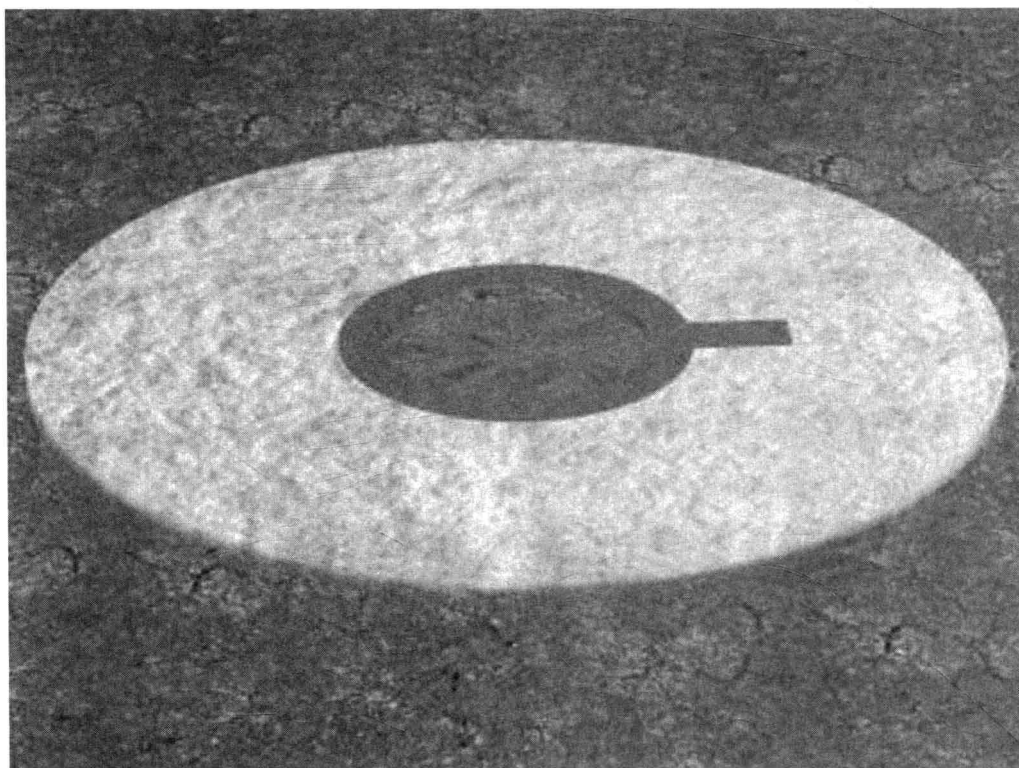
童（钟）丽（离）公柏之用戟。

故据铭文可知，此墓主人为钟离国君，名柏^④。《周礼·春官·典命》：“子男五命，其国家宫室车旗衣服礼仪皆以五为节。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礼记·王制》：“小国之君不过五命。”钟离君柏墓出土五鼎四瑚，合于此制。又同墓所见钮钟9件、编磬12件，与山东莒南大店镇春秋2号墓所出相同。彼墓钟铭所记作器者为“莒叔之仲子平”，亦即其后尊为莒国国君的兹平公^⑤，其与钟离君柏为小国之君身份相当。《周礼·春官·小胥》言古代乐悬之制云：“王宫悬，诸侯轩悬，卿大夫判悬，士特悬。”钟离君柏墓出土编钟编磬各一套，适合“判悬”之制。然钟、磬实属“金石之乐”，据学者研究，享有此礼之春秋墓葬，中原之虢、郑、三晋及周仅约百分之一，楚墓则仅千分之二^⑥，这种现象也与墓主身为国君的事实相合。

钟离君柏墓之价值除补足有关钟离古国的史料之外，更在于墓葬所呈现的繁复特异的形制。该墓圆形，自封土以至墓室共呈六种不同的结构现象，各具内涵。墓上封土及墓内填土皆由青、白、赤、黑、黄五色土混合封筑填充（图二），封土下则为圆形墓口；墓口顶端为以白色细石英砂砌筑之圆壁形遗迹（图三）；圆壁遗迹之下为以五色填土构成的自中央圆区向外辐射的宽窄不等的放射土带（图四；图五）；此层之下则为沿墓坑周边连续堆筑的半圆形土丘遗迹（图六；图七；图八）；再下为以三至四层圆锥形“土偶”建筑的圆形遗迹（图九；图一〇）；最下则为“亚”形墓室（图一一）。这些遗迹完整而系统地体现了上古先民所具有的独特宇宙观，传达了对基于天文学而产生的传统时空观、政治观、宗教观、祭祀观、礼仪制度及哲学观的综合思考。现在我们通过考古学与文献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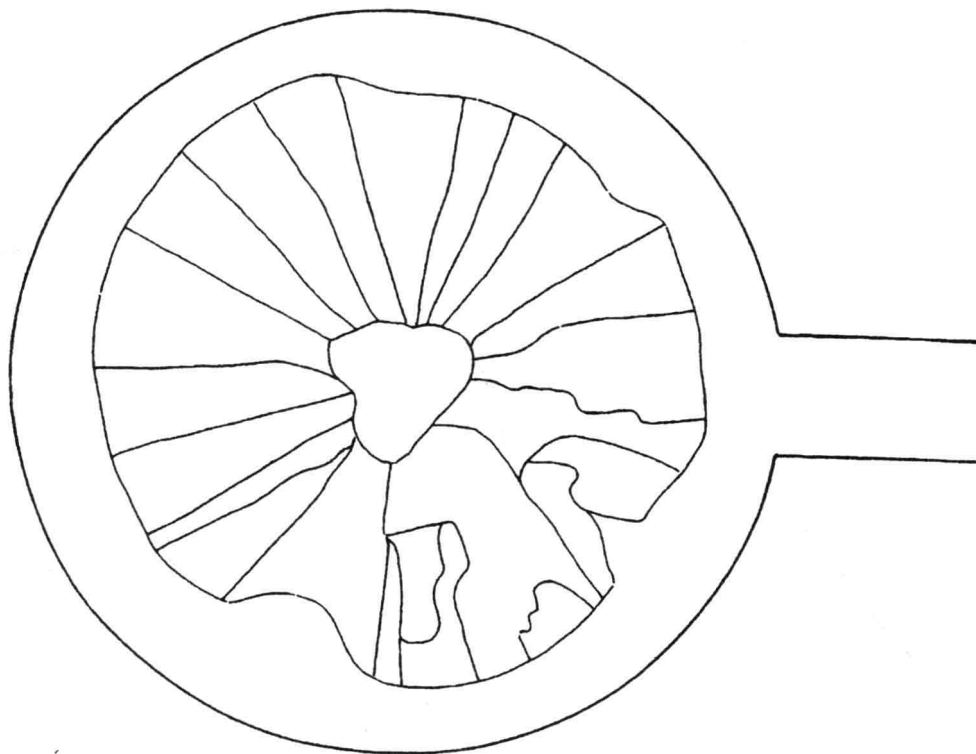
图二 钟离君柏墓五色封土及圆壁遗迹剖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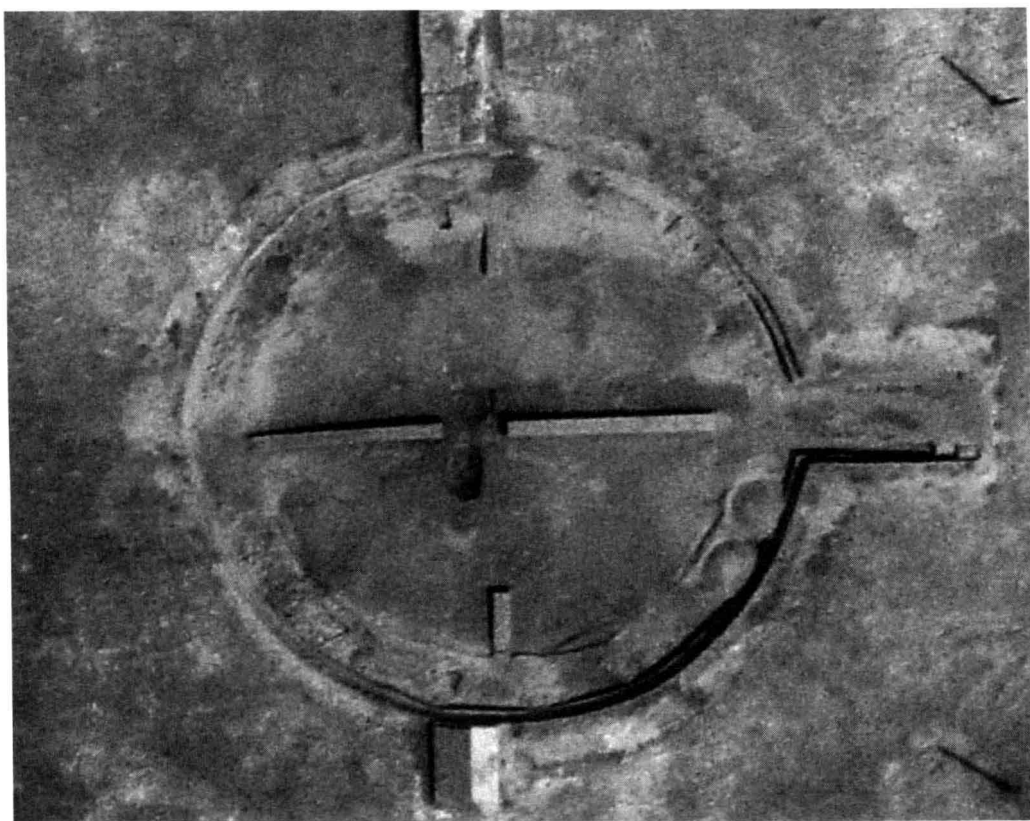
图三 钟离君柏墓圆壁遗迹复原



图四 钟离君柏墓放射遗迹



图五 钟离君柏墓放射遗迹示意图



图六 钟离君柏墓圆形墓坑及形埕遗迹鸟瞰



图七 钟离君柏墓形埕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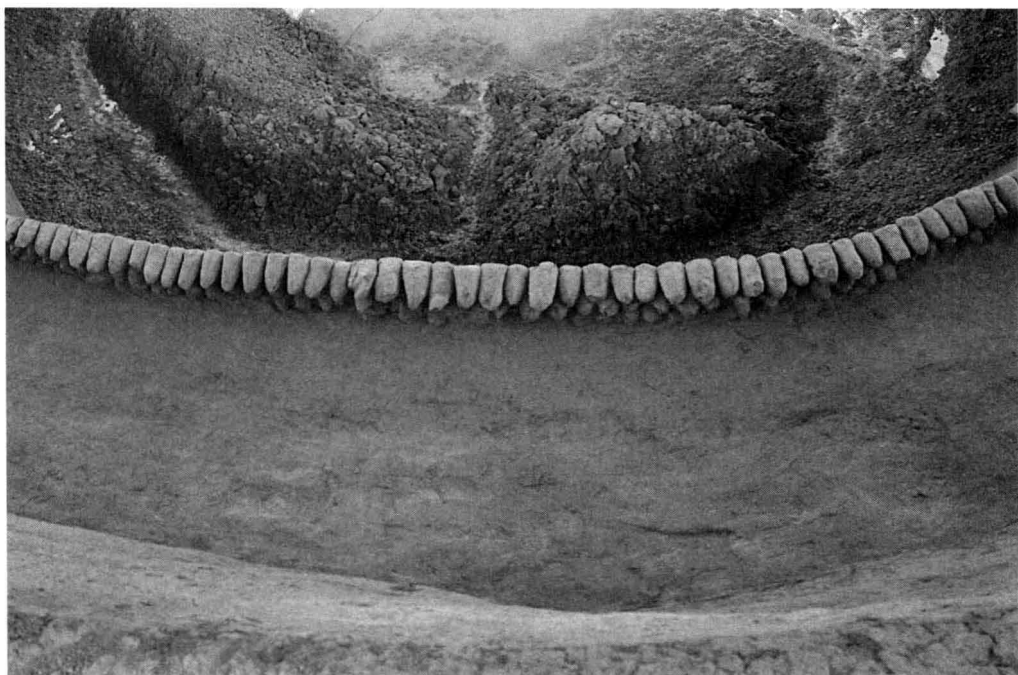
图八 钟离君柏墓形埕遗迹分层细部

综合阐释，揭示钟离君柏墓诸遗迹的具体内涵及其所反映的朴素思想。

中国古代的墓葬制度始终恪守着一种传统，这就是通过墓穴的形制再现墓主生前所在的现实世界，从而以一种独特的宇宙观体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精神追求。现实世界的基本存在就是天地，这种宇宙模式当然成为古代墓葬所要表现的基本内容。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的属于公元前第四千纪中叶的仰韶时代墓葬^⑦，其墓穴的设计呈现南圆北方（图一二），从而以传统的南天北地的观念表现盖天家所认识的天圆地方的宇宙模式^⑧。这种对于古代宇宙观的平面表现，其意义显然旨在描述一种灵魂升天的宗教仪式^⑨。然而在更多的墓葬当中，天地的形状却往往通过完整的立体模式而加以表现，如殷墟侯家庄 1001 号商代王陵，不仅墓室与椁室均呈“亚”形，同时椁室的地板也铺成“亚”形（图一三，1）^⑩，以象大地，而与“亚”形大地相对的墓顶当然就是天宇；不啻如此，墓坑底部殉葬的九位殉人皆手持兵器（图一三，2），其中正中的殉人执大型石戈，其余八人则皆执铜戈，象征墓主的护卫侍从^⑪。这种以武士戒卫而使墓主躯魄安葬于大地的观念在战国初年的曾侯乙墓中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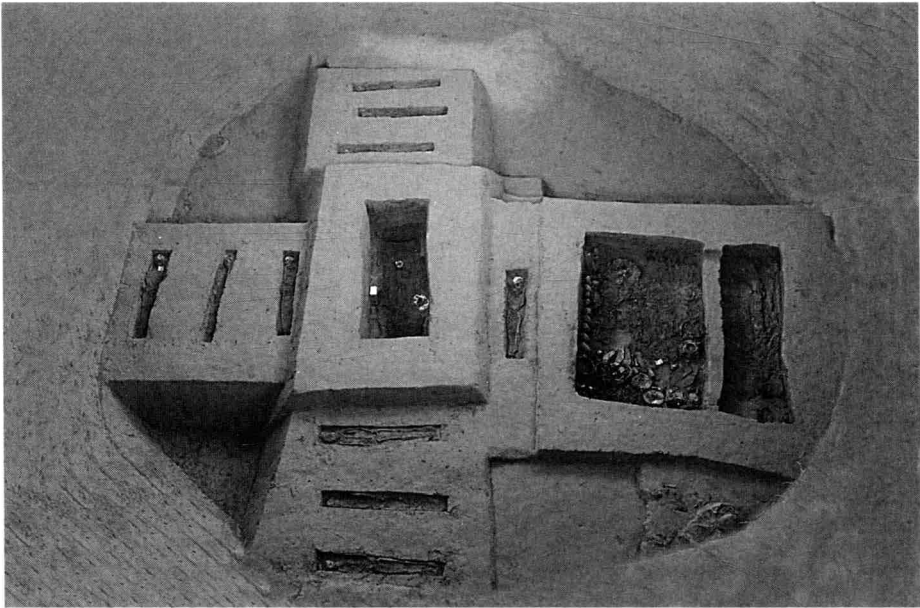


图九 钟离君柏墓八极遗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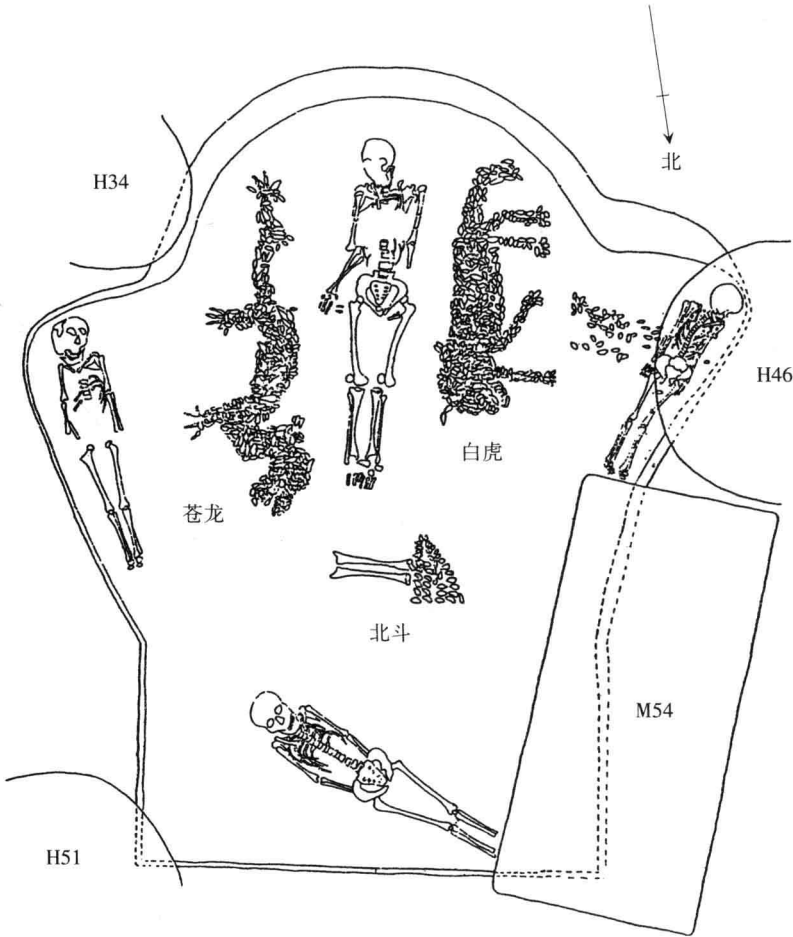


图一〇 钟离君柏墓八极遗迹细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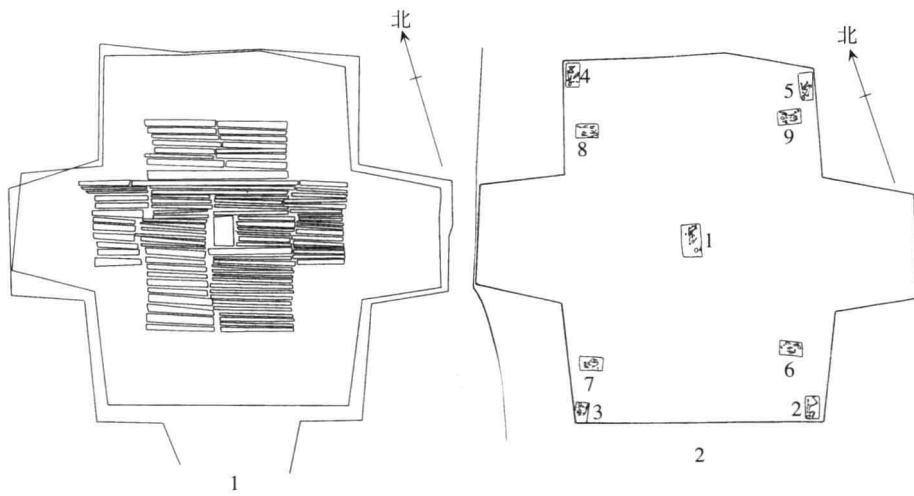
到了再现，墓主漆棺即绘出居室的门户，其间则绘有持戟守护的卫士（图一四）^⑩，喻意显然也在以棺木所在的墓室象征大地。《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陵“上具天文”，“下具地理”，而西汉以降的砖室墓普遍将墓顶筑为穹窿形状，墓室筑为方形，并于方形的墓室或筑门户，甚至汉画像石墓时见于石筑门户上刻有题记，径称墓室为“万世宅兆”^⑪，而与大地相对的穹窿墓顶或更绘制星图，从而



图一一 钟离君柏墓“亚”形墓室（西向东）



图一二 河南濮阳西水坡 45 号墓平面图



图一三 殷墟侯家庄 1001 号墓

1. “亚”形木室地板遗迹平面图 2. 墓坑底殉葬坑分布图



图一四 曾侯乙墓内棺图像

以立体的墓葬形式表现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这种通过墓葬形制而完成的宇宙模式从平面到立体的再现，无疑反映着古人对于天地宇宙的共同理解^⑩，而钟离君柏墓特殊形制所具有的含义当然也应遵循这样的思路加以研求。

二、五色土遗迹与月令思想

钟离君柏墓墓上封土及墓中填土乃由青、赤、白、黑、黄五色土混合封筑填充（图二）。据发掘者介绍：

该墓的封土堆较大，呈馒头形，底径60、高9米，是目前在淮水流域所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墓葬封土之一。封土中没有发现人工夯筑的迹象，其构建方式应为堆筑。值得注意的是，该墓的封土以及墓坑内填土与众不同，均为黄、灰（青）、黑、红、白等五色的颗粒状混合土。这五种颜色的土并非全部产自当地，如黑色土和白色土在当地就没有见到，可能需从异地取运。

墓中独取五色土封填显然具有特殊的文化含义，其为完整地探索古代墓葬制度所体现的宇宙观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

对五色封土填土含义的解释存在两种思考的可能。首先，中国传统的方色理论表现为以五色配伍五方，具体做法即为东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黑色和中央黄色。这个方色理论的构建基础其实很简单，这就是中国大陆以中原黄土为中心所呈现的五方不同土色的自然地理事实，而人们一旦将这些源于自然地理的知识施用于礼制，便是天子大社的配土规制。《礼记·祭法》：“王为群姓立社为大社。”孔颖达《正义》：“大社在库门内之右，故《小宗伯》云『右社稷』。”《尚书·禹贡》：“厥贡惟土五色。”伪孔《传》：“王者封五色土为社。建诸侯，则各割其方色土与之，使立社，煮以黄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洁，黄取王者覆四方。”

大社之布土乃以五色土各依方位而设，呈现东方青土、南方赤土、西方白土、北方黑土、中央黄土的独特布局，以示天子享有天下之土，也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象征。而王于大社祈请，自也为天下苍生祈福。明代大社今犹存北京紫禁城右之社稷坛，坛上即呈五色土依方而布的形制，系皇帝为天下百姓祈福之所。而商代甲骨文已有“右社”之文^⑪，可明大社之制渊源甚久。然大社之礼乃天子独享，不容移用于诸侯卿大夫社，故钟离君柏墓之封土填土以五色土杂封，不依方色布位，于形式上既不僭天子之礼，其喻意当然也不同于大社之礼旨。

五色土杂封之礼犹见于古封禅礼俗。《史记·封禅书》记汉武帝于元鼎中封禅泰山，“五色土益杂封”，是如祭天地之礼。古人封禅，目的即在致太平而告成功。出土新莽封天玉牒文云：“万岁壹纪。……封亶泰山，新室昌[炆]。”^⑫其祈求国祚长久之愿了然可明。然告太平何以独取五色土杂封为礼？这种做法应该来源于古老的顺时施政的传统政令观，反映了古代天文学对于传统政治观的深刻影响。换句话说，封禅礼天旨在祈福祚长久，而这一愿望的实现只能仰赖于用事的顺天应时，这意味着五色土杂封实际是通过一种特别的封筑方式以表现传统天文观与政治观的结合，其于钟离君柏墓以封土的形式呈现，内涵显然也应与封禅礼的思想意蕴相同。因此，钟离君柏墓五色土杂封的

做法虽与大社礼无关，又无涉封禅事，但其体现的由封禅礼所传达的祈福告成的传统时空观与政治观却十分清楚。

笔者曾经指出，中国传统的时空关系表现为空间决定时间^⑦，人们要测得精确的时间，就必须首先测得精确的空间，这意味著作为空间的表述符号既可以表述方位，当然也可以用来表述时间。如表示空间的东、西、南、北四方不仅具有方位的意义，同时也含有由四方决定的二分二至的时间意义。中国传统时空观的这一特点使得作为时间基础的空间思想可以完成与时空关系有关的一切观念的配伍。准确地说，在传统的空间体系中，由子午、卯酉二绳交午所构成的五方由于适应着原始进位制的需要，当然表现着最基本的空间方位，而五方既可以与十日、五帝、五佐、五行、五虫、五音、五数、五味、五臭、五祀、五俎相互配合，当然更可以与体现空间本旨的方色相配。事实上，这些内容与其说更多地体现着空间的内涵，倒不如说更强烈地反映着以四时为本质的时间内涵。很明显，如果追溯五方的朴素表现形式，五色由于缘起于古人的自然地理知识，因而对于完整地表达方位思想，颜色便具有着较其他任何形式都更为质朴和直观的特点与优势。况且基于空间决定时间的独特传统，空间观念的本质其实并不仅仅在于表现方位，更在于表现时间，这使五色理所当然地成为传统时空思想的象征符号，这种做法甚至可以从公元前第三千纪中叶的红山文化时代系统地追溯出来^⑧。因此，青、赤、白、黑不同颜色的喻义实际并非仅在标识四方，更在于暗喻由四方决定的二分二至四气以及春夏秋冬四时，而中黄的存在不仅使空间思想得到了完善，而且也意味着由这种完整而精确的空间所决定的时间同样完善。所以，五方色虽为空间之象征，但其所传达的文化内涵却远不止空间，更有由空间观念所决定的时间，这便是钟离墓五色封土填土含义的思想基础。

钟离君柏墓五色封土填土虽然具有时空的象征意义，但简单地表现时空却显然不是墓葬设计者所要传达的思想。如果我们以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为背景思考这一问题，那么很明显，这种以五色土象征时空的表现手法无疑意在强调一种独具特色的传统政令观。古人朴素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使他们很容易认识到顺时应事的必要，并逐渐以这样的标准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使传统的政令观发展为体现基于时空观的月令制度。这种月令思想不仅古老，而且由于中国传统天文学的官营特点，因此长期被统治者奉为治国的方略，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礼记·月令》对于月令思想的记述相当完整。在月令体系中，四时不仅与五方相配属，体现了时间乃由空间决定的古老观念，而且五方除分配十日、五帝、五佐、五行、五虫、五音、五数、五味、五臭、五祀、五俎之外，更配以五色。内容择述如下：

春三月 天子居青阳，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旗，衣青衣，服仓玉。

夏三月 天子居明堂，乘朱路，驾赤骝，载赤旗，衣朱衣，服赤玉。

中央 天子居大庙大室，乘大路，驾黄骝，载黄旗，衣黄衣，服黄玉。

秋三月 天子居总章，乘戎路，驾白骝，载白旗，衣白衣，服白玉。

冬三月 天子居玄堂，乘玄路，驾铁骝，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

这些内容以天子之居、乘、驾、旗、服、玉皆应方色的做法以见顺合四时的施政原则。由于空间乃是时间的形成基础，故本诸空间的五色既象五方，更象四时。或者换句话说，时间的观念不仅可

以通过方位来表达，而且也可以通过与方位栓系的颜色来表达。显然，钟离君柏墓五色土遗迹的基本内涵即是借五色以表现五方四时，从而传达月令岁时宜忌的古老制度。

《月令》以五方五色配伍四时，东方青色主春，南方赤色主夏，西方白色主秋，北方黑色主冬，而中央黄色配于季夏之末，且四时各月又分配十二律，详列每月宜忌，上及祭祀灾变，下至衣食住行，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皆有严格之规定，宗旨则在体现用事施政顺应天时的政治思想。因此，月令思想的核心其实即在于顺时而立政，而《月令》除于时空数术主配四时以显示天人和谐之外，更列悖时行事以致阴阳失调之祸害。兹但举春三月之文以明之：

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蚤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焱风暴雨总至，藜、莠、蓬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久。

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行冬令，则阳气不盛，麦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

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则天多沈阴，淫雨蚤降，兵革并起。

这些思想于《淮南子·时则》中则有完整的传承。《淮南子·要略》云：

《时则》者，所以上因天时，下尽地力，据度行当，合诸人则，形十二节，以为法式，终而复始，转于无极，因循仿依，以知祸福，操舍开塞，各有龙忌，发号施令，以时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从事。

又蔡邕《明堂月令论》云：

《月令》篇名因天时制人事，天子发号施令，祀神受职，每月异礼，故谓之《月令》，所以顺阴阳，奉四时，效气物，行王政也。成法俱备，各从时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明不敢泄渎之义，故以明堂冠月令，以名其篇。

古人以为，顺时而施政用事则阴阳合，风雨调，国泰民安，否则将阴阳失调，风雨不时，国乱民贫。很明显，顺天时而施政令实际是古人追求的合于天地之道的神圣抉择，是关乎国家治乱的根本制度^⑨，这便是《月令》所要传达的核心思想。钟离君柏墓以五色土混合封筑填充，借方位与时间的契合以体现顺时施政的政治思想，这种特异的筑作形式显然具有为君者顺天时以用事的象征意义，况且这一做法也与墓主人尊为钟离国君的独特身份至为吻合。

《礼记》之成书虽在西汉，但其中各篇之撰作年代却多在先秦。《汉书·艺文志》载时见先秦古文《记》达五种二百余篇，是为小戴《记》所择取。此五种古文《记》有：

《记》百三十一篇 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

《明堂阴阳》三十三篇 古明堂之遗事。

《王史氏》二十一篇 七十子后学者（师古曰：“刘向《别录》云 六国时人也。”）

《乐记》二十三篇

《孔子三朝》七篇

诸《记》皆先秦古文旧籍，于汉尚存。今湖北荆门郭店楚墓所出及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其中之儒家文献多属此类^②，乃二戴《记》编纂之原始材料。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引晋陈邵《周礼论序》始谓大戴删古《记》为八十五篇，小戴更删大戴为四十九篇，然班固、范曄皆无此言。《隋书·经籍志》袭陈氏之说，更以小戴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而《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为马融所足，其谬益甚。据郑玄《目录》，《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皆《别录》所有，不容马融所增；又孔颖达《礼记正义》引刘向《别录》云：“《礼记》四十九篇，《乐记》第十九。”知本无四十六篇之数；况《后汉书·桥玄传》云：“七世祖仁，着《礼记章句》四十九篇。”仁乃成帝时人，时已称四十九篇。故《隋志》之说无可信从，戴震、钱大昕、臧镛堂、陈寿祺、黄以周、梁启超等皆辨之甚详^③，是明《月令》之作亦当先秦古文。

《月令》之著作年代，迄无定说。郑玄《目录》云：“名曰《月令》者，以其记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也。以《礼》家好事抄合之。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孔颖达《礼记正义》云：

此卷所出，解者不同，今且申郑旨释之。按吕不韦集诸儒士着为十二月纪，合十余万言，名为《吕氏春秋》，篇首皆有月令，与此文同，是一证也。又周无太尉，唯秦官有大尉，而此《月令》云“乃命大尉”，此是官名不合周法，二证也。又秦以十月建亥为岁首，而《月令》云“为来岁授朔日”，即是九月为岁终，十月为授朔，此是时不合周法，三证也。又周有六冕郊天，迎气则用大裘，乘玉辂，建大常日月之章，而《月令》服饰车旗并依时色，此是事不合周法，四证也。然按秦始皇十二年吕不韦死，十六年并天下，然后以十月为岁首，岁首用十月时，不韦已死十五年，而不韦不得以十月为正。又云《周书》先有《月令》，何得云不韦所造？又秦并天下立郡，何得云“诸侯”？又秦以好兵杀害，毒被天下，何能希德施惠，春不兴兵？既如此不同，郑必谓不韦作者，以《吕氏春秋》十二月纪正与此同，不过三五字别。且不韦集诸儒所作为一代大典，亦采择善言之事，遵立旧章，但秦自不能依行。

其驳郑极是。孙希旦《礼记集解》云：

陈氏祥道曰：天人之道虽殊，而象类之理则一。圣人将有行，将有为，仰观日月、星辰、霜露之变，俯察虫鱼、草木、鸟兽之化，不先时而起，不后时而缩，以之授民时而无不顺，因物性而无不适。此《尧典》若昊天以授民事，《周官》“正岁年以序事”之意。愚谓是篇虽祖述先王之遗，其中多杂秦制，又博采战国杂家之说，不可尽以三代之制通之。然其上察天时，下授民事，有唐、虞钦若之遗意。马融辈以为周公所作者固非，而柳子厚以为瞽史之语者亦过也。

所论近是。《月令》本属《明堂阴阳记》文，是为先秦古文，虽有秦人笔墨，但其思想体系之形

成则远在战国以前。《尧典》开篇即言观象授时之制，《周易》乾坤卦爻辞也言观象制度与顺时施政^②，皆可明月令思想起源之远。而《月令》各月皆记日躔与昏旦中星，据历术推算，其乃东周之天象^③。近出春秋晚期郈夫人嫪鼎铭云“孟春在奎之际”，与《月令》仲春之月“日在奎”之天象表述全同，知楚历之孟春实当夏历之仲春^④，可证《月令》天象之时代。《国语·楚语上》：“教之令，使访物官。”韦昭《注》：“令，谓先王之官法、时令也。”《国语·周语中》引《夏令》云：“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即此之类。而《月令》显亦时令之属，益明《月令》主体内容之形成当不晚于春秋。事实上，中国悠久的观象授时的历史早已为基于授时活动的政令观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并造就了古代哲王法垂象以施化，顺其度以修德，去危就安，转祸为福的政治传统。

月令思想发展至东周时代，早已从一种根深蒂固的用事习惯转变为具有制度意义的政令传统，其思想之进益有序而清晰。古人追求的合于天地之道的行事规则显然源起于他们长期的生产实践。数罟不入洿池，鱼鳖则不可胜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便不可胜用；而春搜、夏苗、秋猕、冬狩各有规矩，猎狩则无有绝期。这种顺时用事的做法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即已见记载^⑤，甚至在当时，其行事准则已经作为一种制度被固定了下来。显然这为东周时期月令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建立了坚实的基础。

东周文献有关月令思想及其政令制度的记载相当丰富。《左传·成公十八年》：“时用民，欲无犯时。”《左传·昭公七年》：“政不可不慎也，务三而已，一曰择人，二曰因民，三曰从时。”《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而于《管子》一书，相关之制度俯拾皆是。《管子·五行》：“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致《管子·幼官》、《四时》、《轻重己》等篇，则于月令思想之汇聚最为集中。《幼官》与《幼官图》以五色配伍五方四时为政令之基，颇存上古之政令制度。而《四时》对于月令思想之阐释不仅系统，也为《礼记》之相关篇章所不及。兹略举其文以明之：

管子曰：令有时，无时则必视顺天之所以来。……唯圣人知四时。不知四时，乃失国之基。不知五谷之故，国家乃路。故天曰信明，地曰信圣，四时曰正。……信明圣者，皆受天赏，使不能为悖。悖而忘也者，皆受天祸。……是故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径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

……

北方曰月，其时曰冬，其气曰寒。寒生水与血，其德淳越，温怒周密。其事号令，修禁徙，民令静止，地乃不泄，断刑致罚，无赦有罪，以符阴气。大寒乃至，甲兵乃强，五谷乃熟，国家乃昌，四方乃备，此谓月德。月掌罚，罚为寒。冬行春政则泄，行夏政则雷，行秋政则旱。是故春凋、秋荣、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气之贼也。刑德易节失次，则贼气邀至，贼气邀至，则国多蓄殃。是故圣王务时而寄政焉，作教而寄武焉，作祀而寄德焉。此三者，圣王所以合于天地之行也。

《通典》以为《月令》出于《管子》，此说虽未必确实，但《管子》对于月令思想的集中阐释却显示出对渊源有自的顺时立政的传统政令观的总结。《荀子·王霸》：“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

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是谓之政令行，风俗美。”《史记·太史公自序》：“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故曰『四时之大顺，不可失也』。”显然，至东周时期依旧广为流行的顺时立政的观念，无疑为钟离君柏墓以五色土杂封象征为政者顺天应时的做法建构了坚实的思想背景。

三、圆璧遗迹与盖天观念

钟离君柏墓五色封土之下为以白色细石英砂砌筑的圆璧遗迹，嵌封于墓口顶部（图三；图七）。发掘者指出：

在封土堆底部发现一层白土垫层，构建于墓口外的生土之上，厚20~30厘米左右。此白土垫层的范围与封土堆底部大小基本一致，完整地清理出来后，从高空俯视，平面近似于玉璧形，即以白土垫层为肉，墓坑为好，非常壮观。……在挖建墓坑之前，先将选择好的基地整平，再在墓口外铺垫一层白土。

很明显，从中国传统墓葬形制具有以墓顶象征天宇的文化特点分析，圆璧遗迹的涵义显然应该具有天宇的象征意义。

中国古代的宇宙理论大致包括三种学说，即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宣夜说属于一种无限宇宙的理论，难以借模型加以描述和表现，因而这一学说尽管更具有科学的意义，但充其量也仅停留在思辨的层面，以致其传承无法持久^⑥。浑天说实即独特的天球理论，与古代墓葬所呈现的宇宙模式不合。而盖天说的理论核心则为天圆地方，其说起源甚久，且影响深远，成为古代墓葬再现天地宇宙所普遍采用的形式。由此观之，此墓的圆璧遗迹显然体现了盖天观的宇宙思想。

盖天说的宇宙图式称为“盖图”，盖图的核心部分则为表现一年十二个中气太阳周日视运动轨迹的“七衡六间图”，见载于《周髀算经》。“七衡六间图”为由七个同心圆组成的图形（图一五，1），其中内衡象征夏至日道，第四衡象征春秋分日道，外衡象征冬至日道。这三个同心圆由于是古代纪时制度的基础，因而构成了“七衡六间图”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七衡六间图”的基本图形其实就是表现二分二至日行轨迹的所谓“三衡图”（图一五，2）。这个图形所表现的三环，在中国古人的传统观念中被称为“三天”。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言及分至四神“奠三天”、“奠四极”，意即分至四神测定二分二至^⑦。从盖天家的角度讲，二分二至的日行轨迹其实就是以三个同心圆所呈现的“三天”。而相关的考古遗存则在属于公元前第四千纪中叶的西水坡宗教祭祀遗迹以及公元前第三千纪中叶的红山文化圜丘遗迹中均有存留^⑧，而且相沿至明代天坛祭天圜丘等相关建筑之设计，概念一脉相承，足见这一思想形成历史之悠久。

《周礼·春官·大宗伯》：“以苍璧礼天。”郑玄《注》：“此礼天以冬至，谓天皇大帝，在北极者也。……礼神者必象其类。璧圜，象天。”贾公彦《疏》：“明此苍璧礼天者，是冬至祭圜丘者也。”